

“固守”抑或“逃离”： 当下大学生预期就业一线城市偏好探究

□ 陆杰华, 岑欣仪

摘要: 近年, 一线城市巨大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使得不少在北上广深工作的人纷纷前往其他城市就业和生活, 在校大学生在面临这样的就业环境和“逃离”北上广深现象时, 在未来的就业城市规划上会出现怎样的趋势和特点? 本文基于“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 尝试分析当下大学生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偏好的现状, 以及筛选和确定影响大学生将一线城市作为其理想工作地点的主要相关因素。研究发现, 近年在校大学生的预期就业偏好并不存在“逃离”一线城市的趋势, 反而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想在毕业后前往一线城市就业。logistic 回归的结果发现,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决定攻读更高学位和就读院校位于一线城市的大学生相比其他大学生而言体现出更强的一线城市就业倾向, 而上大学前的户口状况和教育层次则并没有显著影响。对此, 决策者在促进大学毕业生一线城市的就业的同时, 也应着力推动其他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 从而为各城市均衡输送新活力。

关键词: 北上广深; 一线城市; 大学生; 预期就业地点偏好

中图分类号: C9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023(2021)06-0066-09

一、研究背景

早在十年前, 白领间兴起一种“逃离北上广深”的思潮, 即逃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而移居到其他二、三线城市^①的社会现象^[1]。与此同时, 从 2009 年至 2019 年,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房价涨幅分别为 228.86%、243.51%、198.84% 和 241.00%, 成功挤进过去十年房价涨幅最高的 10 个城市^[2]。在生活成本方面, 位列全国前四的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在 2019 年 Mercer 公布的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中分别位列第 7、8、10 和 17 位, 其后的南京已排至 27 位^[3]; 但在可支配收入上, 2019 年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位于全国城市的第 1、3、5、9 位^[4]。生活成本和可支配收入形成的反差, 以及高企的房价, 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相比其他城市有较大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 其生活压力位列全国前五, 每天休闲时间少于 2.5 小时, 不足美国、德国和英国等国家国民每天休闲时间的一半^[5]。

在此情形下, 不少打工者无论工作阶层高低, 纷纷逃离一线城市而涌向二线城市发展和生活, 逃离北上广深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消退的迹象, 反而还有所加剧。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资料, 2015 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增速首次低于本地常住人口增速^[6]。在另一个半球, 逃离大城市的戏码同样上演着^[7], 《纽约邮报》统计发现, 2010 年至 2017 年离开纽约前往美国其他地方的人比其他地方去纽约的人高出近 100 万^[8]。在全球范围内, “逃离”大城市以追求更好生活品质的潮流同样在伦敦、芝加哥等大城市悄悄蔓延, 并且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离开城市前往乡村的人群平均年龄相比 10 年前年轻了 10 岁^[8]。

在逃离一线大城市的潮流下, 大学生群体的预期择业地点未免会发生相应变化。大学生就业区域

作者简介: 陆杰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岑欣仪,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21ZDA106)

收稿日期: 2021-04-10

① 一、二、三、四线城市的划分往往没有严格统一的标准, 本文的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划分标准依据国家统计局在《住宅销售价格统计调查方案》中的划分, 具体参见 http://www.stats.gov.cn/tjfw/tjzx/tjzxbd/201811/t20181121_1634999.html。

的改变主要源于外部因素(环境)和内部因素(心理)的改变。在外部因素方面,葛玉好等使用扩展的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对大学生就业地域的多元化趋势进行分析,发现城市间的收入差距、就业机会可获得性的差别、心理成本和短期的货币收入等都是影响大学生就业区域的影响因素^[9]。同时,居高不下的房价也对大学毕业生的择业产生影响,虽然高昂房价使得毕业生希望前往薪资较高的大城市和岗位就业,但真正面对大城市的购房压力时,多数毕业生实际上辞掉一线城市的工作而选择在中小城市再就业^[10]。在心理因素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学生在择业观上变得更加灵活,勇于尝试互联网催生的各种职业^[11],并着重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能力的发展^[12]。岳昌君使用2003年至2011年的5次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抽样调查数据发现,21世纪初高校毕业生把工作岗位能否施展个人才华、体现人生价值视为最重要的择业因素^[13]。

不过,在宏观环境和微观因素一同改变的情况下,大学生的预期就业地点产生了何种变化仍未明朗。有报道称2013年高校毕业生中有61%主动逃离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而前往二三线城市工作生活^[14],但也有报道称该数据结果为“伪命题”^[15]。在权威数据的缺失下,全社会难免对大学生的预期就业走势缺乏了解,同时影响或推迟了政府相关政策的形成。大学生作为习得最新知识和技能的群体,其流向势必能够为相关区域带来动力和活力,促进相关区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因此,了解当下大学生的理想择业城市,分析其预期就业区域趋势,对促进大学生就业和出台具体相关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系城市的社会稳定和未来发展。为此,本文尝试使用2013年、2015年和2017年当代大学生调查数据,重点揭示近年来大学生预期就业城市偏好的趋势,并探讨哪些大学生群体倾向于前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进行就业。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其研究假设

张锦雯和赵晓明的研究显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巨大的竞争压力和高涨的生活成本,迫使不少高校毕业生离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随着二线城市的经济发展,二线城市的就业和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其竞争压力小、发展机会多、基础设施日渐完善,因此人才向其他城市流动的趋势愈加明显^[16]。但总体来讲,关于大学生就业的公开数据主要以市场调查为主,并重点针对毕业生的就业流向进行调研,较少关注在校生的就业城市意愿或偏好,因此我们仍未能得知当代大学生在其就业地区的未来规划上是否存在“逃离”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现象或趋势。根据已有的数据和报告,大学生在就业上“是否逃离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命题存在争议,较为一致的是新一线^①和二线城市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增加,不同的结论可能是源于这些调查采用了相异的抽样框和调查方法。

《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毕业生就业比例持续下降,从2014届的25%下降到2018届的21%,但新一线城市的吸引力则不断增强,从2014届的22%上升到2018届的26%^[17]。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公布的《2019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留在北京工作的比例呈持续三年小幅度下降趋势^[18]。虽然在京毕业生留京就业比例持续下降,但2019年留在北京就业的北京高校毕业生占比61.76%,从比例来看,北京这类一线城市仍表现出强劲的虹吸效应。《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亦显示,在前往北上广深就业的毕业生比例持续下降的同时,继续留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大学生比例也同步下降:刚毕业时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毕业生中,在三年内离开一线城市的比例明显上升,从2011届的18%上升到2015届的24%^[17]。

虽然以上调查均显示大学毕业生在一线城市就业比例持续下降,但知名职场社交平台领英发布的《2018年轻职场人城市流动趋势洞察》^[19],以及脉脉和京东共同发布的《2019高校毕业生就业趋势报告》^[20],乃至智联招聘发布的《2019年中国年度最佳雇主评选报告》^[21]均显示,对于95后毕业生而言,一线城市仍是毕业后职场起步的首选,其中深圳、杭州、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别是就业吸引力最大的5座

① 新一线城市的划分标准仍未统一,同时每年划分的新一线城市仍在变化中,因此本研究所引用的文献对新一线城市的归类存在些微差异,故而本文引用的研究或报告书中提到的新一线城市需依据其具体内容而定。

城市。但《2018 年轻职场人城市流动趋势洞察》和《2019 高校毕业生就业趋势报告》显示,一线城市的吸引力在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的 90 后群体中已有所下降,新一线城市取代上海、北京而成为年轻人的下一个就业地点选择;同时新一线城市对毕业生的吸引力正稳步上升,例如成都的排名从 2017 年的第十位,上升至 2018 年的第八位,及至 2019 年的第七位^{[19][20]}。

除了新一线城市对毕业生的吸引力增加外,由于二线城市推出的各项吸引人才政策,以及二线城市发展机会的增多,因此不仅是在二线城市就业的毕业生有所增长,就连实际留在二线城市就职的高校毕业生也有所增加。BOSS 直聘研究院的报告显示,2018 年二线城市应届本科生整体留存率相比 2017 年增加 3.5%, 达至 64%^[22];智联招聘的 2018 年应届毕业生就业力市场调研则显示,二线城市为 25.94% 毕业生的期望就业地,同比上升 4.74%^[23]。

由于毕业生的就业流向容易受到不同城市就业难度的影响,因而毕业生的就业地点不仅反映出是否存在逃离北上广深的就业选择趋势,还反映了一线城市在就业上的挤出效应。因此,不同于毕业生的就业流向,在校生的就业偏好能更好地反映当代大学生的求职趋势,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代大学生在就业上是仍然愿意选择固守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还是“主动”地逃离一线城市。故而,在逃离还是聚集于一线城市的命题尚未清楚的情况下,本研究尝试探究 2013 年至 2017 年的在学大学生在就业偏好上是否存在逃离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明显趋势,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哪些大学生群体倾向于流向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

关于择业地点的影响因素方面,由于调查群体和方法的不同,相同的影响因素的显著作用在不同研究中可能存在或消失。有学者指出,院校类型、就读地、年龄和性别对工作地点的选择没有影响,但生源地所属地区类型、自我认知的社会阶层和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值则影响显著^[24]。云绍辉通过对千禧年以来的大学生就业区域流向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就读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学生偏向于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大城市择业,而就读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大学生偏向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中小城市工作^[25]。朱迪的研究同样揭示了相似的结果,他发现男性、“90 后”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要分别高于女性和“80 后”,而城市生源、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大学生在一线城市的就业比例也高于农村生源和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26]。

有研究利用全国 17 所高校的毕业生调查问卷数据,试图探讨大学生的城乡背景如何影响其就业结果;并指出城乡背景对大学生的就业地点流向起的是间接作用,因为城镇大学生相比农村大学生更可能就读层次较高的院校,从而更容易在地级市及以上的城市成功找到工作;而农村大学生由于其生源地教育资源较城镇差而多就读于较低层次的院校,也就更可能在乡镇或县城进行就业^[27]。也有研究对生源地、对择业地点的影响群体进行了区分,发现一般的毕业生偏向于留在生源地就业,但重点高校毕业生和研究生更倾向于离开生源地,而留在院校所在地就业^[28]。

刘彦林和马莉萍两人的研究则表示,大学教育对就业地点的影响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院校所在地为地级市及以上级别城市,二是提高人力资本的大学教育,该两种途径均可使大学生进入更高级别的地区进行就业^[29]。2018 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平均薪酬位列全国各城市薪酬排行榜的前五位^[30],而想攻读更高学位的大学生,一方面有希望提高其能力和锻炼其技能的祈愿,另一方面也有想要前往更高平台进行发展的愿望,故可假设决定攻读更高学位的大学生更希望前往一线城市进行就业。

总而言之,由于刚毕业的大学生可能没有足够先赋性资本作为启动资金在一线城市立足,再加上后致性社会资本相对较低的大学生或许较难在一线城市获得理想就业岗位,因此先赋性和后致性社会资本相对较高的大学生更期望在毕业后前往一线城市工作,也即是说生源地为城市、受教育层次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大学生更偏向于在一线城市就业。此外,就读地区作为大学生生活了好几年的城市,往往是未进入社会的年轻人除家乡外最为熟悉的城市,再加上一线城市就业机会多、生活丰富,因此在一线城市就读的大学生难免对其院校所在地产生黏性^[28],故而我们可以假设院校地区位于北上广深会对其一线城市就业倾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另外,有研究显示大部分独生子女大学生选择所在省份之内就业而非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其中过半数更少青睐所在省份的城市^[31]。从另一方面来看,兄弟姐妹数量较多的情况下,大学生会在就业地

点上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承担着更大的养家责任,因而或许会更多地前往一线城市进行就业。因此,本文假设作为独生子女会对在一线城市择业产生负面影响,而兄弟姐妹数量则会对选择一线城市作为工作地点产生正向影响。最后,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加入年龄和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探讨核心自变量对一线城市就业倾向的影响。

三、数据、变量测量与分析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2013年、2015年和2017年“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开展,是自2010年开始的一项全面、深入地了解当代大学生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过程中的教育和就业、恋爱和婚姻、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等诸多内容的大型全国跟踪调查。

该调查采用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根据现行国家教育体系的特点,包括高校等级(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高校类型(综合类、理工类、文科类)和地域分布(北上广、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中、华东和华南),选择具典型代表性的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各4所作为调查样本。其后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先是在全校范围内随机抽取八个院/系/专业,然后在选定的院/系/专业内各年级随机选择一个班级,最后在班级内随机抽取相应数量的学生,并使用网络调查的方式对其进行追踪调查。2013年、2015年和2017年调查各共获得包括在校和应届毕业生在内的7230个、11039个和13981个有效样本,剔除缺失值后,2013年、2015年和2017年分别最终保留样本6176个、8977个和13011个。

(二) 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是否选择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作为毕业后的就业地点”,选取2013年调查问卷中的“毕业后您最想去工作的城市”和2015年、2017年调查问卷的“毕业后您最想去的工作地”该条问题,并对其中“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这一选项进行0、1编码。

自变量方面,在生源地上,本研究将通过上大学前的户口状况来进行划分,分为非农户口和农业户口两种;受教育层次则进行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三类的划分;院校所在地区简单划分为一线城市和非一线城市。由于个体的教育程度往往决定了其社会地位,而父亲往往是一家之主,因此家庭的社会地位用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为代表,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职高、高职/专科和本科及以上五种。此外,家庭的经济地位以大学生自我认知的家庭经济状况为代表,选取问题“与周围同学相比,您的家庭经济条件是”,其选项有“非常好、比较好、一般、不太好、很不好”五类,由于该问题回答“非常好”和“很不好”的样本较少(0.71%和3.71%),因此本文把前两个选项和后两个选项各自合并,将其再次划分为“较差、一般和较好”三类,并以较差为参照组来进行回归。由此,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两个变量,分别是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与周围同学相比的家庭经济条件。

因此,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为性别和年龄,核心自变量则是包括户口状况、受教育层次(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院校所在地、兄弟姐妹数、是否独生子女、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是否想攻读更高学位。表1为logistic回归中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及其描述性分析。由于本文的logistic回归仅采用2017年的“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因此该描述性分析仅针对2017年的在校大学生样本而言。从总样本来看,男性和女性、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决定攻读更高学位和决定不攻读更高学位的大学生比例相当,均占一半左右。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当代大学生平均拥有的兄弟姐妹数量不足1个,为0.76个。过半数样本为大学生,其次为专科生,占比最少的为研究生。超过六成当代大学生自我认知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其他同学的家庭经济状况相近,表明大部分大学生的家境状况与其他同学相比不存在较大差距。

毕业后想在一线城市择业的大学生和毕业后想在其他地区就业的大学生相比较,两者的性别比和年龄较为相近,但非农户口占比、本科生和研究生占比、院校位于一线城市的比例、独生子女占比、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决定攻读更高学位的比例在毕业后想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大学生中均更高或更好。另外,平均兄弟姐妹数量在毕业后想在一线城市择业的大学生群体中反而相比毕业

后想在非一线城市工作的大学生群体要低,表明兄弟姐妹更少的大学生更愿意前往一线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表 1 模型中的变量描述性分布

| | 全部 样本 | 期望在 一线城市择业 | 期望在 其他地区择业 |
|-------------|----------|---------------|---------------|
| 毕业后一线城市择业/% | 35.32 | - | - |
| 男性/% | 47.78 | 48.88 | 47.18 |
| 年龄/岁 | 20.24 | 20.23 | 20.24 |
| 非农户口/% | 45.70 | 56.00 | 40.08 |
| 受教育层次/% | | | |
| 专科生 | 36.72 | 25.31 | 42.95 |
| 本科生 | 51.53 | 62.44 | 45.57 |
| 研究生 | 11.75 | 12.25 | 11.48 |
| 院校位于一线城市/% | 19.90 | 39.96 | 8.95 |
| 兄弟姐妹数/个 | 0.76 | 0.67 | 0.80 |
| 独生子女/% | 45.11 | 52.43 | 41.11 |
| 父亲受教育程度/% | | | |
| 小学及以下 | 17.95 | 14.06 | 20.08 |
| 初中 | 34.68 | 28.68 | 37.95 |
| 高中/职高 | 23.66 | 24.00 | 23.48 |
| 高职/专科 | 9.44 | 11.93 | 8.08 |
| 本科及以上 | 14.26 | 21.33 | 10.41 |
| 家庭经济状况/% | | | |
| 较差 | 25.20 | 21.70 | 27.12 |
| 一般 | 66.01 | 64.33 | 66.93 |
| 较好 | 8.78 | 5.95 | 5.95 |
| 决定攻读更高学位/% | 51.27 | 58.32 | 47.42 |
| 样本量/个 | 13011 | 4595 | 8416 |

(三) 分析方法

为观察在校大学生是否在就业偏好上存在逃离北上广深的现象,本研究首先将2013年、2015年和2017年选择北上广深的比例分群体进行描述性分析。另外,为确定哪些大学生群体倾向于流向一线城市,以及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即“毕业后是否最想去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工作”,为二分类变量,故对2017年的“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数据使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的分析方法。结合已有研究的相关结果,建立当代大学生一线城市就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模型:

$$P/(1-P) = e^{\beta_0} + e^{\beta_1x_1} + e^{\beta_2x_2} + \dots + e^{\beta_nx_n} + e^{\epsilon}$$

其中P为因变量,表示当代大学生毕业后想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概率,P/(1-P)为当代大学生毕业后想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工作和不想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工作的概率比,也称为风险比率。自变量根据既往文献综述包括性别、年龄、户口状况、受教育层次(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院校所在地、兄弟姐妹数、是否独生子女、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是否想攻读更高学位;ε则是其他可能影响当代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工作的因素。

四、主要分析结果

总体而言,毕业后期望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工作的大学生比例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2013年、2015年和2017年毕业后期望在一线城市择业的大学生比例分别为22.67%、34.99%和35.32%。其中该比例在2015年增长迅速,相比2013年增加了12.32%,而2015年和2017年的比例相当,仅增加了0.33%。因此,当代大学生在择业意愿上并不存在“逃离”北上广深的现象,在对未来的城市偏好选择上,预期在一线城市就业的大学生比例反而有增无减。值得注意的是,该比例仅反映当代大学生在就业地点上的偏好及其未来规划,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实际求职中,或由于一线城市的挤出效应,或由于二线城市工作机会增多,故而可能会出现大学毕业生一线城市就业率逐年下降的趋势。

分群体比较来看,不同大学生群体毕业后预期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大致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男性大学生和女性大学生毕业后期望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相当,除2013年女性大学生群体选择一线城市的比例稍高于男性大学生外,2015年和2017年均均为男性大学生想在一线城市择业的比例较高。户口性质比较上,非农户口的大学生中期望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要高于农业户口的大学生中期望在一线城市工作的比例。在不同的教育层次中,本科生相比专科生和研究生在就业意愿上更偏向于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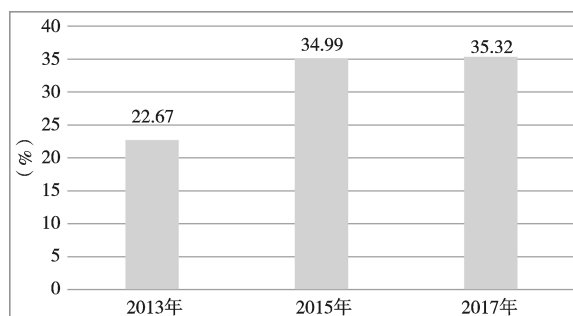


图 1 当代大学生总体毕业后想去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

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其中研究生心仪就业地点为一线城市的比例又会高于专科生。

另外,就读于一线城市院校的在校生选择毕业后在北上广深就业的比例远高于院校位于非一线城市的毕业生,这可能是由于在一线城市就读的大学生的地利之便,在当地生活和学习了几年的大学生在当地建立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难免对就读地产生黏性,以至于期望留在一线城市寻找工作机会^[28]。与以往印象相反,独生子女的大学生中期望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反而超过非独生子女十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独生子女在意愿上更偏好前往一线城市就业,但在实际工作中反而是在父母所在城市就业的现象^[31]。在父亲受教育程度方面,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大学生想毕业后在一线城市择业的比例也就越高,同时各年相比增加的比例也越多。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大学生越是期望在一线城市工作。其中,2015年和2017年,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大学生中过半数期望在毕业后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其比例远高于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和较差的大学生。与预计的相同,决定攻读更高学位的大学生相比决定不攻读更高学位的大学生有更高的一线城市就业偏好,一方面期望攻读更高学位的在校学生对未来有更高的期待,另一方面部分大学生会希望通过获得更多人力资本的方式而在一线城市就业。

就不同年份的比较而言,不同群体均显示出更强的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偏好。而分群体在不同年份间的对比,我们更可以看到不同年份的不同群体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也即在不同群体的比例的排序在不同年份间较少出现差异。由于本研究所采用的“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为追踪调查,因此以下我们将仅使用2017年的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考察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分群体的大学生之间其一线城市就业偏好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表3。

从logistic回归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大学生比女大学生拥有更高的毕业后期望留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可能性,约高出12.73%。而年龄、户口状况和受教育层次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对毕业后期望在一线城市就业的偏好并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不同的年龄、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专科生和本科生、专科生和研究生之间,在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作为毕业后的理想择业地点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在农业和非农户口的对比上,虽然在比例上有更多非农户口的大学生倾向于在一线城市就业,但正如以往研究所表明的,城乡背景是通过影响就读院校的层次继而影响其就业地点,从而或许造成了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在控制了院校地点后对一线城市就业倾向不存在显著作用的局面。

为此,我们在模型2中除去院校所在地的变量,可以看到上大学前的户口状况对大学生的一线城市就业偏好存在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受教育层次对一线城市就业倾向从不存在显著作用变为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显示受教育层次也通过就读地点对一线城市就业偏好发挥影响作用。非农户口、本科生和研究生更多就读于一线城市^[32],从而增加了其一线城市就业偏向。数据显示,11.78%的本科院校位于北上广深,相比下大专院校位于一线城市的比率仅有本科院校的一半,为6.89%^[31]。

院校位于一线城市的大学生,则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就业偏好:院校位于一线城市的大学生将一线城市作为其理想工作地点的概率是非一线城市就读的大学生的六倍以上,表明当代大学生在未来规划上会对院校所在地产生黏性,显示出就读地区对未来就业的巨大影响^[28]。虽然兄

表2 不同年份的不同大学生群体毕业后期望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

| 群 体 | 2013年 | 2015年 | 2017年 |
|-----------|-------|-------|-------|
| 女性 | 23.68 | 32.98 | 34.57 |
| 男性 | 21.54 | 37.08 | 36.13 |
| 农业户口 | 18.00 | 29.07 | 28.62 |
| 非农户口 | 28.37 | 40.84 | 43.27 |
| 专科生 | 16.17 | 26.67 | 24.34 |
| 本科生 | 25.69 | 37.64 | 42.80 |
| 研究生 | 18.17 | 34.24 | 36.82 |
| 院校地点 | | | |
| 非一线城市 | 17.51 | 27.33 | 26.47 |
| 一线城市 | 49.65 | 64.74 | 70.92 |
| 非独生子女 | 17.92 | 30.91 | 30.61 |
| 独生子女 | 28.79 | 39.26 | 41.05 |
| 父亲受教育程度 | | | |
| 小学及以下 | 16.55 | 26.93 | 27.65 |
| 初中 | 18.51 | 30.58 | 29.21 |
| 高中/职高 | 22.99 | 34.42 | 35.82 |
| 高职/专科 | 26.72 | 40.81 | 44.63 |
| 本科及以上 | 35.35 | 47.52 | 52.80 |
| 家庭经济状况 | | | |
| 较差 | 18.56 | 28.12 | 30.41 |
| 一般 | 23.26 | 34.55 | 34.42 |
| 较好 | 33.57 | 55.39 | 56.17 |
| 不决定攻读更高学位 | 17.28 | 32.09 | 30.21 |
| 决定攻读更高学位 | 28.73 | 38.04 | 40.17 |
| 样本量/个 | 6176 | 8977 | 13011 |

弟姐妹每增加1个,毕业后想在一线城市工作的概率增加6.96%,但该影响并不显著,也即兄弟姐妹数对一线城市就业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区别于零,因此兄弟姐妹多的大学生和兄弟姐妹少的大学生在一线城市就业偏好上并没有显著区别。但从模型1到模型2,兄弟姐妹数对北上广深就业偏好的正向作用从不显著变为显著,同样显示了兄弟姐妹数对院校所在地起着间接作用。兄弟姐妹数较多的大学生相比兄弟姐妹数较少的大学生会更少地在北上广深等地就读^[33],从而影响了其毕业后的择业地点规划。另外,要注意的是,当兄弟姐妹数为零,即作为独生子女则对一线城市就业偏好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即独生子女的一线城市择业倾向相比非独生子女高出17.98%。因此,对于独生子女而言,其更愿意上更愿意前往一线城市工作,显示出养老压力对子女的未来规划未产生较大影响。但真正到求职时,可能碍于家庭结构的缘故,作为独生子女的大学生或会更多留在父母所在的地区进行择业^[34]。

父亲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结果则表明,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想大学毕业后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可能性也越高,但仅有父亲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大学生与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大学生相比才存在显著不为零的差异。此外,自我认知的家庭经济状况相比周围同学较好的大学生,显著倾向于在毕业后于一线城市工作,其倾向于在一线城市就业的可能性相比经济状况比周围同学较差的大学生要高出68.51%。从父亲受教育程度和自我认知的家庭经济状况来看,仅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大学生群体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会显示出对一线城市择业倾向的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社经地位一般和家庭社经地位较差的大学生之间在北上广深就业倾向上则没有显著差距。

最后,计划攻读更高学位的大学生相比不计划攻读更高学位的大学生,其毕业后想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偏好要高出45.89%。在某方面反映出决定攻读更高学位的大学生,一方面想通过攻读更高学位获得在一线城市就业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攻读更高学位的大学生也怀有对未来规划的更高期待。但有趣的是,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之间在一线城市就业偏好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大学生在就读更高学位后,或能更好地了解自身需求和所想,故而在未来就业地区的规划上会更加贴合自身情况。

五、结论与讨论

在“逃离北上广深”现象大热以及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和压力不断上升的当下,在校大学生在未来就业地点的规划上,究竟会选择“固守”还是“逃离”一线城市?全国性调查数据显示,就在校大学生的未来就业城市偏好而言,“逃离”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现象并不存在。相反,我们会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毕业后期望留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大学生占比反而更多。但对这群大学生而言,其在毕业后或仍会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但能真正留在一线城市的就业人数仍是未知。因此,即使在就业偏好上不存在“逃离”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现象,但在实际就业中或许真的存在于一线城市就业的大学生逐年减少的趋势^[17]。同样地,本研究结果也未能否定当代大学生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表3 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作为择业地影响因素估计结果(logistic模型)

| | 模型1 | 模型2 |
|--------------------|---------------------|---------------------|
| 男性 | 1.127** (0.046) | 1.040 (0.040) |
| 年龄 | 0.980 (0.014) | 0.979 (0.013) |
| 非农户口 | 1.048 (0.054) | 1.207*** (0.059) |
| 受教育层次(参照组:专科生) | | |
| 本科生 | 1.003 (0.051) | 1.756*** (0.082) |
| 研究生 | 0.966 (0.090) | 1.707*** (0.147) |
| 院校位于一线城市 | 6.209*** (0.337) | - - |
| 兄弟姐妹数 | 1.070 (0.039) | 1.130*** (0.038) |
| 独生子女 | 1.180* (0.080) | 1.298*** (0.083) |
| 父亲受教育程度(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 | |
| 初中 | 0.965 (0.058) | 0.985 (0.058) |
| 高中/职高 | 1.038 (0.070) | 1.078 (0.070) |
| 高职/专科 | 1.183 (0.105) | 1.227* (0.104) |
| 本科及以上 | 1.371*** (0.117) | 1.495*** (0.121) |
| 家庭经济状况(参照组:较差) | | |
| 一般 | 0.978 (0.048) | 1.027 (0.048) |
| 较好 | 1.685*** (0.138) | 1.858*** (0.143) |
| 决定攻读更高学位 | 1.459*** (0.062) | 1.223*** (0.049) |
| 常数项 | 0.336*** (0.099) | 0.320*** (0.088) |
| 似然比卡方 | 1739.20*** | 724.45*** |
| 自由度 | 15 | 14 |
| 样本量/个 | | 13,011 |

注:(1)***, **, * 分别表示在0.1%、1%和5%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工作几年后,不会前往其他城市再就业^{[10][17]}。

但从该结果看,在房价逐年上升、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生活质量下降以及二线城市发展迅速的背景下,当代大学生对一线城市的热情仍未熄灭。作为就业机会丰富、薪资较高、生活选择较多、教育和医疗资源丰厚的一线城市,仍是大学生想施展其抱负和能力的的首选。在校大学生中将一线城市作为其首要的理想就业地点的比例仍存在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希望能在一线城市获得其工作“初体验”,并为今后工作经验积累提供必要储备。

而哪些大学生会偏向将一线城市作为其理想工作地点呢?从前面分析的结果来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更高、决定攻读更高学位、男性、就读院校位于一线城市的大学生比其他大学生会更期望在毕业后前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发展,但户口状况和年龄则对其一线城市择业倾向没有显著影响,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文的假设。一方面,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工作需要一定的资本支撑^[35],因此父亲的学历越高、家庭经济状况相比其他人越好,其越能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放在其首要选项上。另一方面,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具有大量工作机会,其工作薪资普遍高于其他城市,因此越是期望获得较好和丰富生活的大学生,也就越想在毕业后在一线城市就业^[24]。从这角度来说,不难理解部分大学毕业生在一线城市工作几年后前往二线城市寻求工作机会的决定^[17],毕竟一线城市生活成本位于全球前列^[3],仅靠其较高的薪资和多彩的生活选择,仍可能较难获得或保持一个较为理想的生活状态。

此外,就读院校所在的区域往往是在校大学生除家乡以外生活得最久和了解得最多的城市,在拥有缤纷的校园生活的同时,也看到了一线城市暗藏的丰盛工作机会,因此在理想就业地点上对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产生较大黏性^[28]。在对模型系数进行标准化后,就读院校是否位于一线城市该变量的回归系数仍远远大于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显示出院校所在区域对就业城市地点的未来规划上的重要影响。同时也给了二线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的一个启示,也即提升自身高校实力以吸引人才,同时为在校大学生增加当地就业的辅导、引导和宣传,以提高高校人才留在当地工作的就业率,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最后,对于在校大学生一线城市就业倾向的上升趋势,决策者一方面可采取相应措施,例如适当降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落户门槛,鼓励大学生在一线城市实习、就业和创业等,促进大学生真正流入并留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为一线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注入更多活力。另一方面,决策者也可增强其他城市的宣传工作,同时促进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使得不同城市和区域就业的大学生均等获得较为理想的薪资和待遇;而当地政府也可加强其就业辅导和当地工作机会的宣传工作,提高其他城市作为当代大学生理想就业地点的可能性,均衡不同类型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 [1]姜继玲.离开“北上广” 职场逆流是谁的机会[J].新前程,2010(4):18-19.
- [2]曾英杰.过去十年,中国房价上涨最高的20个城市有哪些?[EB/OL].[2019-12-26].<https://zhuanlan.zhihu.com/p/99459864>.
- [3]寰宇留学.2019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出炉,中国有3城超过纽约!亚洲超乎想象“高成本”![EB/OL].[2019-07-21].<https://www.163.com/dy/article/EKKGP1CP0518P442.html>.
- [4]搜狐城市.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百强榜:上海人均超7万,浙江11市集体入围[EB/OL].[2018-07-13].https://www.sohu.com/a/427915061_120179484.
- [5]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人休闲时间变少 一线城市工作压力大[EB/OL].[2018-07-13].<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180713/herald/3131cda7e4a88184d3c4587fbc48643e.html>.
- [6]北京市统计局.常住外来人口增速下降 来源地相对集中——北京市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系列分析之二[EB/OL].[2016-02-03].http://tjj.beijing.gov.cn/zt/rkjdsdjd/201603/t20160322_143417.html.
- [7]侯隽.美国版“逃离北上广”[J].中国经济周刊,2017(15):68-69.
- [8]BBC 英伦网.揭秘:为何出现年轻人“逃离”大城市潮流[EB/OL].[2019-03-19].<https://www.bbc.com/ukchina/simp/47626114>.
- [9]葛玉好,牟小凡,刘峰.大学生就业地域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扩展的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11(4):81-89.
- [10]夏高发.高房价对大学毕业生择业的影响[J].中国青年研究,2011(6):56-59.
- [11]朱丽丽,韩静.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择业观的嬗变与思考[J].未来与发展,2019(5):40-45.
- [12]周文霞,黄均雄.当代大学生择业观的特点与成因——一项基于文献的研究[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5+2.
- [13]岳昌君.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2003—2011[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1):32-47+188.

- [14] 社会万象. 2013“最难就业年”落幕 六成大学生逃离北上广[EB/OL]. [2014-01-09]. <https://news.qq.com/a/20140109/005096.htm>.
- [15] 光明日报. “六成大学生逃离北上广”不可信[EB/OL]. [2014-02-14].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214/c70731-24357831.html>.
- [16] 张锦雯, 赵晓明. 我国大学生面向二线城市发展及就业情况分析[J]. 才智, 2014(6): 149.
- [17] 郭娇, 王伯庆. 2015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 [18]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19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EB/OL]. [2019-12-25]. http://jw.beijing.gov.cn/xxgk/zxxxgk/201912/t20191227_1521978.html.
- [19] 每日经济新闻. 90后首份工作平均干19个月就辞职, 之后他们普遍去了新一线城市[EB/OL]. [2018-11-22].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8-11-22/1275044.html>.
- [20] 北青网. 《2019高校毕业生就业趋势报告》发布, 京东以产业创新带动更高质量就业[EB/OL]. [2019-09-09]. https://www.sohu.com/a/339828408_255783.
- [21] 每日经济新闻. 智联招聘2019年度报告: 国企成大学生就业首选, 一线城市吸引力强[EB/OL]. [2019-12-20].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9-12-20/1394934.html>.
- [22] 中国新闻网. BOSS直聘发布《2018高校本科应届生就业竞争力报告》[EB/OL]. [2018-12-11]. <http://industry.people.com.cn/n1/2018/1211/c413883-30460462.html>.
- [23] 川商. 应届毕业生最愿去哪就业? 调查显示成都等新一线城市吸引力最强[EB/OL]. [2018-05-30]. https://www.sohu.com/a/233482752_611447.
- [24] 何仲禹, 翟国方. 我国大学生就业城市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人文地理, 2015(2): 37-42+102.
- [25] 云绍辉. 大学生就业区域流向研究现状与展望[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6(3): 43-47.
- [26] 朱迪. 北上广还是二线? ——大学毕业生就业区域流向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5(11): 96-102.
- [27] 肖富群. 城乡背景对大学生初次就业结果的影响——基于全国17所高校2914名毕业生的调查数据[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4): 178-184.
- [28] 马莉萍, 潘昆峰. 留还是流? ——高校毕业生就业地选择与生源地、院校地关系的实证研究[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3(5): 118-124.
- [29] 刘彦林, 马莉萍. 高校毕业生返乡就业的影响因素及就业质量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9(2): 80-88.
- [30] 矿业界. 2018年各城市薪酬排行榜出炉, 你拖后腿了吗?[EB/OL]. [2018-08-18]. https://www.sohu.com/a/248633699_253609.
- [31] 澎湃新闻. 这份高校分布地图 暴露了各大城市的真实实力[EB/OL]. [2019-06-25]. <http://edu.sina.com.cn/gaokao/2019-06-25/doc-ihytcerk9167633.shtml>.
- [32] 李春玲.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察[J]. 社会学研究, 2010(3): 82-113+244.
- [33] 张月云, 谢宇. 低生育率背景下儿童的兄弟姐妹数、教育资源获得与学业成绩[J]. 人口研究, 2015(4): 19-34.
- [34] 张可佳, 王雨, 曾浩铃, 董辉. 90后城镇独生子女在校大学生就业地意向调查[J]. 中国商论, 2017(23): 153-154.
- [35] 胡小武. 摇摆的青春: 从逃离“北上广”到逃回“北上广”的白领困境[J]. 中国青年研究, 2012(3): 66-69+56.

“Stick to” or “Escape from” First-tier Cities: A Study on Current College Students' Preference on Expected Work Location

LU Jie-hua, CEN Xin-yi,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tremendous pressure of life and work in first-tier cities has made many people who work in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go to other cities for employment and living. When college students face such an employment environment and the phenomenon of “escaping” from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what trend and characteristics will they have in future work place planning? Based on the “Panel Study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preference in first-tier citi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nd the main relevan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ollege students' preference for first-tier cities as their ideal working plac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is no tendency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flee” from first-tier cities in their expected employment preference in recent years, but more and more college students want to work in first-tier cities after graduation. The result of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s that college students whose family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is higher, who decide to pursue higher degrees, and whose universities are located in first-tier cities show stronger employment tendency than other college students, while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tus level before entering college and education level have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response, policymakers should boost the employment rate of college graduates in first-tier cities while also promo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ther cities so as to bring new vitality to cities in a balanced way.

Key words: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Shenzhen; first-tier cities; college students; expected work location preference

责任编辑 吴兰丽